**时 文 美 文**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2017届

高二（上）第03期 （总15期）2015-10-09

本期主编 尹迎君

=========================================================================================

## 屠呦呦获诺奖，人民日报这三篇文章应该看一看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让国人振奋。但随之而来的是很多追问。

有人说：屠呦呦获诺奖打破了几个中国记录——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女科学家，土生土长未出国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未获院士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国际期刊)的科学家，中医科学家（来自朋友圈，转自九三学社中央科普委副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钮文异教授分享）。著名科学家饶毅在博客和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中发问：屠呦呦做出举世公认的成就，为什么没有得到任何国内的重要认可，没有大奖、没有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屠呦呦在1970年代做出重要成就，条件很差、经费有限，今天我国的经费大增，用于支持什么工作，什么人？我国的体制，在浪费钱，还是能够出现更多的重要工作？我国的文化，是在压制人，还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张亭栋？我们应该麻木不仁，继续浪费，还是深刻的反思、实际的改革？我国科技界由无德、无才、无能主导的现象，是否应该得到改变？饶毅老师的这些追问，犀利又具体，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相信每个对国家发展有期待的网友，在阅读屠呦呦相关新闻的同时，这些疑问会不由自主地一个个冒出来，大家的追问是从内心压不住的。不仅是对国家、体制的追问，也许，围绕屠呦呦获奖，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会成为热议的话题。比如，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将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研究的代表，奖项颁给了她一个人，其他人会不会质疑、不满，会不会有人认为“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身处现实的中国，这些问题绕不开。我对这些话题，也十分感兴趣。一篇一篇相关文章读下来，还是觉得，我的同事赵永新在2011年秋屠呦呦获拉斯克奖时，在人民日报发过的三篇系列评论最为精彩。赵永新老师通过这三篇文章，对上述问题都有针对性回答和分析，特此分享给大家。

（注：“柏木钉”为赵永新笔名。赵永新为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记者，他曾第一个报道了圆明园防渗事件，当时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

####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之一——一人获奖不公平吗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第16版科技视野“科技杂谈”栏目作者：柏木钉

前不久，拉斯克基金会把2011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贡献。这是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授予中国科学家。这一迟到的国际认可在国内引发的，除了自豪、兴奋，还有不绝于耳的争议，和值得倾听的反思。屠呦呦的获奖，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一座奖杯。透过这面多棱镜，探讨分析其折射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无裨益。“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自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类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我们不妨对青蒿素研究的历史稍作梳理——1967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1969年1月，年轻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以组长的身份加入该项目。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筛选，该小组最后把焦点锁定在青蒿上。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屠呦呦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号样品”，该样品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为100%。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报告的全部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兴奋。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示、鼓舞下，云南药物所的罗泽渊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也分别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临床应用、结构测定和新药研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周维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不难看出，长达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确是协作攻关的集体结晶。故此，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一再表示：“我想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们中国科学家群体，” “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以“第一”论英雄，也是其他国际科学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历届诺贝尔科学奖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提出“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两个月发明更有效的测定方法的德国化学家米夏埃尔·卡拉斯和弗伦茨·希伦坎普只好望洋兴叹；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则名落孙山；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光纤通信的发明者高锟，而不是后来突破光纤工艺、实现产业化的美国康宁公司与日本仙台大学的学者……以“第一”论英雄，并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第一发现者在科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个发现者或发明人开启了希望的大门，为后来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试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无从谈起，“东方神药”不知何时才能诞生。科学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险。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创”，才能激发更多的勇者不畏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执着攀登。如果在科技奖励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有害：这样做不仅消解了第一发现者或发明人的价值，也会打击他们的创新积极性，阻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

####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之二—— 三流条件何以创造一流成果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7日第20版科技视野“科技杂谈”栏目作者：柏木钉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在2011年拉斯克奖颁奖典礼上，斯坦福大学教授露西·夏皮罗以这样的表述，高度评价青蒿素的发现。让国际同行感到震惊的是，这一“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却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正如2002年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在《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真正让外国同行们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网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难得做出世界级的领先成果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挖掘原创的成果。这话可谓一语中的。前不久在第五届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立大会上，荣誉组长周光召坦言：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由于急于求成、过于浮躁，虽然我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连年递增，跟踪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就是缺乏能开辟新领域的重大原创成果。科技界的浮躁现象之所以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比如，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繁琐、评估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难怪许多科研人员呼吁：尽快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给科研腾出一片净土，鼓励年轻人安安心心地做科学！在期待体制尽快改善、环境及早净化的同时，科研人员也应自励自省，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毕竟，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当年好了许多；而体制的改革、环境的完善尚需时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就青蒿素的研究历史进行深入调查，他的这段话意味深长：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之三—— 为什么落选院士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4日第20版科技视野“科技杂谈”栏目作者：柏木钉

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 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

【联合报╱薛仁明】

暮春时节，因简体《孔子随喜》出版，遂有十余天的大陆之行；从沪杭，往成都，再至北京，所见所闻，多有感触。其中之最，则是，大陆的读书人，实在太不快乐了。

读书人的郁结忧深，两岸皆然；真要多找些清朗之人，也着实不易。但相较说来，大陆的读书人，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知识分子才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当政者也心知肚明，于是，防民如防贼；提防知识分子，尤其彻底。两造之间，疑忌日深；彼此互信，荡然无存。结果，越骂越防，越防越骂。因此，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一张张的脸，躁、怒、愤、戾，全然全然，都是纠结。

看着他们纠结的脸，又想着他们天下国家的怀抱，两相对照，不禁感慨，也让我想起了那位焦虑的母亲。这回，是在北京首都图书馆的公开讲座，讲题「与孔子闻风相悦」，我特意留一小时给听众提问。底下之人五花八门，所提问题各式各样。有人问起了陆王心学宛如博士口考之题目，也有人提起了小孩越来越不快乐该怎么办的大哉问。我特别记得，这大哉问者，是位看来学识不丰还带些土气的家庭主妇；但我直觉亲切，很能体会她的真实感。比起许多的博学之士，她的问题，毋宁是更无半点浮辞与虚语。

我未能详答，只略略言道，一般说来，小孩忧郁，是因父母焦躁；父母放松了、明朗了，小孩才可能快乐得起来。学校里不也一样，除了体制之僵化，有些老师其实是过度操心学生，是被自己的「爱心」、「责任感」给团团困住，结果，落得一身浮躁，天天烦闷，那么，又如何教导出身心健全的下一代呢？

我劝她先放轻松；若放得松，孩子就有变化；别急着替小孩紧张。我没说出口的，是孔子那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位」而言，在家里，父母是「君子之德风」，孩子则是「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父母自身，才是关键！

孔子这句话，更可说给大陆的知识分子也来听听。

中国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道德感太深，道德范围太窄，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一天天严肃，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这一僵硬，这一紧绷，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百年来，延续宋儒之紧绷，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这「重责大任」，「压迫」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于是，他们开始慷慨激昂，渐渐地，转成了愤懑乖戾。慷慨与愤懑，看似有别，却常常只是一线之隔，有时也仅仅一步之遥。

正因这样的慷慨激昂，于是，迎来了中共早期之「满怀理想」；而相应于后来的愤懑乖戾，也遂有毛时期之荒腔走板。「满怀理想」与荒腔走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亦仍是一线之隔与一步之遥。日后中共建政，终至文革，知识分子之饱受糟蹋，虽说可伤，虽说可悯，但是，请恕我直言，知识分子与中共彼此之千丝万缕，两者之互为因果，恐怕，连今日动辄痛斥中共当局者，都未必如实观照得到。

性情，才是一切之根本。近代中国政治之败坏，追根究柢，是人坏；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百年来生灵之涂炭，关键原因，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

那群知识分子始终以为，政府之根本问题，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种种昔日之恶，其实是因为人坏，是因为性情扭曲，并非制度有多么的不足。不能因为曾经为恶，便满脑子要设计制度来提防为恶。如此思维，结果必然只是，越坏越防，越防越坏。最后，遂造就了今日双方的猜忌日深与互信荡然。

制度与法治，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最佳例证，就是台湾的民主法治化。这二十年来，尤其陈水扁时代，台湾成日「依法行政」，满嘴法律制度，但是，人心之败坏，莫此为甚。乍看之下，眼前的台湾，「民主」成就斐然，但究其实，舆论失焦涣散，知识分子乏力虚无，整个社会耽溺在物欲与低级趣味中无以自拔。没有人的性情之美作为支撑的民主法治，只会迈向整个社会慢性的萎死。

又比如说，现今台湾的大学评鉴，多有制度呀！数量化，标准化，有条有理，完完全全就是黄仁宇所强调的「数目化管理」；但是，正因这样的「数目化管理」，台湾的大学系统，这些年来，才逐步走向崩坏。因为「数目化管理」，台湾目前的大学，已然容不下大师；将来，也会容不下真正的好老师。台湾教育的沉痾，其实是太有制度，却毫无情性。

昔日秦朝暴虐，但刘邦在建国之初，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而后，唐沿隋制，几无更动，亦同样开出了大唐盛景。秦汉之异，隋唐之别，都不在于制度，而在性情。论起性情，宋儒因道德观念狭隘，总瞧不起刘邦；觉得他既没读书，又像个无赖。殊不知，刘邦的性情，比那一帮儒者，实实要好上许多。刘邦凡事看得开，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厚、通、豁，于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没有读书人的酸腐，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气度，故而连秦朝的暴虐，都伤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褊狭的所谓儒者，最后多被踏杀。

有刘邦的好性情，才有汉朝质朴而大气的四百年好江山。

制度固然重要，但后头人之情性，才是历史之真消息。

我在成都讲座，特别提起，国学热也好，复兴文化也罢，最要紧的，无非是要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讲得更具体，就是要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现今某些专家谈「国学」，一脸市侩气；另有某些专家，则满嘴酸腐气。凡此恶气，不听还罢，一听，恐怕脸部都更要变形难看。见了这些脸，只觉得五四的打倒传统，可真有理！谈「国学」，谈传统文化，若无益于人之性情，那宁可不要！

但是，我这回与双流县的研习会谈话，听他们谈国学，谈传统文化，却是音声清亮，面目净好。我看着这群人，心头欢喜，期待满怀。成都双流县传统文化研习会是个民间组织，成员多样，举凡有公务员、谘商师、电视主播，还有企业主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一个水果行老板，他识字不多，平均十个字，会写错四个。但我谈中国文化，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有滋有味。别人提问，我才答罢，他便用四川话又再评唱一番；他的评唱，我不甚听懂，但看那满堂和气，听那哄堂笑语，再瞅着大家的一脸滋润，我于是相信，中国人该有的脸，是找得回来的。

革当时，民间戕害甚深；但民间水深浪阔，又岂是斲毁得尽？结果，三十年后，休养生息，元气便又恢复了。研习会这群人，都算不得知识分子；但正因如此，他们没有忧郁干枯，也没愤懑乖戾；他们谈传统文化，未必多么深刻，但却是滋滋润润，有神采，有情性。这就对了。

自古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直至近代，读书人仍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良心自居，原都该有「君子之德风」的自觉。然而，不幸的是，百年来民族性情之丕变，是读书人带头迷失；而今，民族性情之恢复，知识分子却又最为殿后，甚至最持异议。当民间元气已然苏醒，甚至共产党政府的少数要员也力抗阻碍，要致力于恢复民族情性之际，独独只有知识分子，愤懑依旧，乖戾如常。他们忧「国」忧「民」，但是，政府与民间，却都比他们健康明朗。他们闭锁书堆，被一堆知识概念搅得脸面扭曲，却丝毫不能自知，还动辄以真理自居，以引领者自任。唉！这该从何说起呢？

百年来，知识分子因过度操切，以至于忘掉了：再怎么天下己任，再如何国家民族，都该以修身为其根本。昔日子路问「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是的，三次回答，三次「修己」；这「修己」，修己之身，才是一切天下国家之起点。要忧「国」忧「民」之前，都该先「忧己」，反省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但是，近代知识分子不仅忘了要「修己」，甚至还找来了一套说辞，撇清了个人修身之必要。知识理论之误人，也莫此为甚！于是，他们不断援引「新」理论，不断论述「新」学说，整天痛骂，成日愤戾；如此这般，终至一己憔悴干枯，国政也日益败坏。如此误人，又如此误己，正是百年来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识分子，因为五四包袱过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个好性情。我以前教书，遇有一些聪明学生，某段时日，突然性情大变，迷失得彻底；那脸，全变了个人似的。然而，隔些年后，再逢又见，他却已然迷途而后返；经此转折，除了恢复旧日样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与淡定。于是，这曾经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无有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后的沉静与安稳。我看大陆的知识分子，亦复如是。他们一脸躁郁，我虽说感慨，却也不甚忧心。因为，说不定，哪天因缘具足了，可能只是起身照个镜子，久未细看的自身脸庞，才一定神，赫然发现，果然不对，真真不对；于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就这样迷途知返，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如此生命翻转，其实一点都不奇特；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生命经验。这一翻转，于是，他们重新要修身，重新观照性情，还发现孔老先生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是老话，但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不必成天议论，不必忧心忡忡，只要他们脸上的躁、怒、愤、戾，经此一转，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厚、通、豁，那么，一个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 平庸的恶

选自《读书》

世纪六十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克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艾克曼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卜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伦特以艾克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以政治道德谈平庸的邪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便是拒绝深化专制的邪恶。深化邪恶的必然结果是将邪恶道德化或者神秘化。极权专制的暴行无不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宏扬纯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它们深刻的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启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经过深化的邪恶显得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决非普通人可以理解。深化邪恶，拔高邪恶，贬抑普通人的认知能力，强迫普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邪恶“大智大觉”的开启和领导。邪恶所造成的苦难于是成为实现某种光辉灿烂未来的必要代价，理解的、不理解的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

阿伦特报道艾克曼，着重在他的官僚心态。艾克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人，也是一个纳粹制度的运作者。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难以启及的理想或思想能力。恰恰相反，他在邪恶当道时为虎作伥，是因为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阿伦特强调“知善”和道德自我启蒙的重要性，不是重申柏拉图的知善即为行善，而是说，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因为思想可以产生(虽然不一定总是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在她最后一部著作《思想的生命》中，她所讨论的正是不思想造成的无判断；不思想使得人不能果断地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事实也证明，专制暴政无一不是以愚民政策、思想钳制为其存在条件。

如何才能避免陷入这种集体之恶呢?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道德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重点放在前者。她一方面坚持知善行善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了解知善并不足以行善的现实。知善行善的条件是保持判断和行动的极大独立性。阿伦特在1964年发表的演说《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指出，“不参与者……是唯一能够自己作出判断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比别人优秀的价值观，也不是因为旧的是非标准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或良心之中。那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尚未进行所谓的自动运作，也就是尚未形成一套学来的或天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他们的标准不同于(一般的大多数人)：他们会问自己，我干过这种事情后，究竟还怎么能心安理得?……这种判断的先决条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智力或者对道德的精细分析，而只是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自己和自己默默地对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称此为思想。”知善行善者面对的是自己，他对善的认知便是他拒绝恶的充足条件。

面对自己，独自担负专制制度下个人的道德责任，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太高的要求，连阿伦特自己也只能想象两种人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一种是有大信仰者，另一种是有大智慧者。前者是近于顽固的执着，后者则有近于傲慢的孤独。

## 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卢新宁（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级本科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谢谢大家！